

回忆丁声树老师

钱 曾 怡

今年是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1909—1989年)逝世10周年,诞辰90周年。丁先生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广为学界所称道。他学问博大精深,是新中国方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本刊同仁,以及许多作者和读者都亲聆过他的教诲。本期特发表钱曾怡教授和石明远先生的回忆文章,以表示我们对丁声树先生的深切怀念。
——《方言》季刊编辑部

1956年7月的一天傍晚,一辆三轮车拉着我和行李来到和平里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下车后一位在门口的老师走过来问我是从哪儿来的,简单问话之后,我被安排到了四楼的学员宿舍。以后才知道,这位就是丁声树先生。当初我没有想到,这位丁先生,竟会在我的一生中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我真庆幸能够成为丁先生的学生。

为了促进汉语规范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这个班从1956年2月开始,每期半年,我是第二期的学员。我们这一期分甲、乙两班:甲班好多是地方教育部门负责推普工作的干部,也有部分中小学教师,主要学习训练普通话,也许还有推普管理方面的内容;乙班多数来自高等学校,除学习普通话的内容以外,主要学习方言调查。甲乙两班分设不同的课程,为乙班开设的有音韵学、方言调查、语音学、北京语音四门,授课的老师前两门是丁声树、李荣,后两门分别是周殿福和徐世荣。两班学员按方言地区分组,我被分配在乙班的一个方言混杂的小组,因为我母语是吴方言,又在北方方言区的山东省工作。为配合讲授,每个小组还安排两位辅导老师,一位辅导音韵学和语音学,一位辅导北京语音,辅导课都是在教学时间表上排定的,非常严格。

在语音研究班,丁先生的和蔼是有名的,见学生总是带着笑容,大家都愿意接近他,向他请教。我还听说有的同学称他“开口呼”,这可能是一种背称,表示亲切,我可从来不敢。我方言音韵方面的基础很差,连调类和调值的问题都很长时间搞不清,同班的许多同学资历深、见识广,我比他们差远了。可是丁先生还是很鼓励我的,我自己也很努力,音韵学期终考试得99分,错在把止合三的“翠”答成蟹合三了,丁先生说情有可原,两分的题只扣一半。方言调查记音实习开始,按规定每个组调查一个方言,在本组的学员中找发音人,我被指定为我们小组调查浙江嵊县话的发音人。我那个组方言调查的辅导员是语言研究所专为参加方言调查而来的任老师,人称任大姐。记音内容是《方言调查字表》,步骤是辅导老师和发音人先行一步,等到我和任老师全部记完了字表,再由我给全组同学发音。说实话,虽然当时已经听过“方言调查”课了,可到底这调查是怎么做的,至少我是心中无数的。辅导老师和发音人的记音都在课余时间进行,丁先生差不多每次都来指导,特别是嵊县音系声韵调的音值,实际上是丁先生确定的。记得有一次记到梗摄开口二等影母的上声梗韵,字表空白。我忽然想起在我的母语中有一句

谚语“冬冷弗算冷，春冷冻杀□”，我说这个“□”（音‘ʔaŋ’）是不是应该在这里。丁先生一听很高兴，接着就在纸上写了一个“犛”，说你的“‘ʔaŋ’就是这个字，见于《集韵》，意思是小牛。后来我查《集韵》，见梗韵“犛”两见：一是“乌猛切”，“犛也，一曰牛鸣”；二是“于杏切”，“吴人谓犛曰犛”。“冬冷弗算冷，春冷冻杀犛”，这话我从小常听大人说，可这个“‘ʔaŋ’是什么，家乡的人都搞不清。这一下子丁先生给我揭开了谜底，我感到这音韵学还很有趣的，丁先生真是了不起，他怎么这么难的字也记得这么清楚！

我有收集、保存方言调查资料的习惯。在各种资料中有我第一次记录母语的《方言调查字表》和后来整理的《嵊县方言同音字表》、《嵊县方言探索》。当时提倡勤俭节约，《同音字表》和《嵊县方言探索》都是用旧讲义反过来写的，用旧报纸当封面，上面还请我的老同学王定伟书写了标题。所谓《探索》，无非是一份嵊县话的音系报告，有声韵调描写、嵊县音跟北京音的对应关系，实在谈不上什么“探索”，我印象中这题目好像也跟王定伟讨论过，记得当时交给丁先生时丁先生还笑了，我忽然意识到这“探索”二字真有些不知深浅，还挺不好意思的。这份作业虽然纸张粗劣，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岁月沧桑，现在已经发黄变脆，我却倍加珍惜，因为这不仅是我从事方言调查的初次实习，而且还保留着丁先生为我字字句句批改的手迹。今天当我回忆丁先生的时候，我着实得意保存了一份如此珍贵的资料。在那份实在是幼稚倒也说得认真的作业上面，丁先生用红、黑两种铅笔为我修改的地方不少于30处。修改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专业方面，通过丁先生的修改，使我了解应该怎样描写方言音系；二是语言修养方面，包括作文的逻辑性、文字的简练乃至错别字和某一个具体音标的书写形式等等。以下是几个具体的例子：

例1 嵊县声母表（以下只列与丁先生修改内容有关的部分）：

ts 祖主	ts' 粗处	dz 池	s 苏生	z 视
tɕ 举	tɕ' 去	dʒ 旗	ɕ 虚	ʒ 墙又

丁先生在表的左边批了“表现尖团”四个字。这里，我原来只注意到例字表现嵊县话[tɕ]不分的问题，忽略了嵊县话分尖团也应从例字中体现出来。

例2 嵊县声母和北京声母的对应关系：

嵊县的 m，北京多数念 m；少数是零声母。

念 m 的如：妹 mɛ²——mèi

念零声母的如：晚、网、问、忘、微、尾、砚、袜。在这些字中，多数是说话音，它们的读书音是以 v 为声母的。由此可见，凡是嵊县声母中，m v 两读的，北京都是零声母。如问 mən' vən'——uən。

丁先生将第一行“少数是零声母”一句，改为“m(白)v(文)两读的北京是零声母”，并划去念零声母的例字“袜”字以后的全部。这显然比我原先的文字简明多了。

例3 2, z 声母在入声字和 iəʔ 这个韵母前面时，常常有它的又读音，入声字和舒声字一样变 z 为 ʒ，去掉韵母中的 i 介音。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音必是念 tɕ 组声母。例如：

手	'səʔ	'ɕiəʔ	——	ʂou
仇	:dzəʔ	:dʒiəʔ	——	tɕ'ou
食	zəʔ	ʒiəʔ	——	ʂi

丁先生将我第一行的“入声字”改为“iəʔ”，旁边写：“未提 s:ɕ:dz:dʒ”，又在本段下面写：“应当指出，s—ɕ 两读、dz—dʒ 两读、z—ʒ 两读的字，在北京是 tɕ 组声母”。

例 4 岷县韵母和北京韵母的对应关系:

a (ai a ie ɿ)

1 大部分的 a 韵母,北京读 ai,如:派 p'a'——p'ai。

2 小部分读 a 的字,如:爸 pa'——pà,不包括 k 组声母在内。

3 k 组声母除了读 ai(措)以外,多读 ie(街)。

4 读 ɿ 时,声母限于 ts 组,而且北京音的声母由岷县的 ts 变为 tʂ。如扯、赦等。

例外字:uo——他 uai——帅 ua——耍 o——破

丁先生把以上 1 的“大部分的 a 韵母”改为“a 韵大部分北京读 ai”,在 2 的“小部分读”下划一红杠,将 3 改为“k 组声母有 k(白)tʂ(文)两读的,多读 ie(街)”。

1957 年 1 月,语音研究班第二期结业,我拿到了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所发给的大红证书。为了能进一步跟着各位老师学习,我继续留在语音研究班半年。丁先生让我参加研究班第三期的辅导工作,辅导音韵学、语音学和方言调查。我辅导的那个组,方言也是比较杂的,记得有北京的,也有西南地区的。我重复听了丁先生等老师的第二次讲课,还在丁先生指导下辅导这个小组记录了云南保山的方言,发音人是范斐章同志。自我感觉这次听课的收获比第一次要大得多,因为除了有前次听课垫底以外,更重要的是接着就得去辅导学员,他们中有的已经是讲师了,好几个都是挺有学问的样子,我怕被问倒了,压力特别大,听得就更加上心。这几天写回忆丁先生的文章,重新翻开当时的笔记,发现有的内容当时虽然记下了,实际上并不了然,直到现在才能有所领悟。以下随便摘录一段,1957 年 1 月 2 日丁先生讲“汉语音韵与方言调查的关系”,其中关于特字问题:

特字,是指在语言的演变上有特殊的地方。就特字情况来看,可以了解到我们语言的发展不是一条线的。特殊情况如下:

1,大多数方言都特殊,不是《广韵》、《切韵》系统的。如“玻”,方言都是阴平声,而且是不送气的,但它是在“滂”母下的字。我们不能说“玻”是由从前的送气变到现在的不送气。而应该说,“玻”好像是古代帮母发展来的,因为没有一方是读送气的。因而可以推想,在很早的时候,这个字就有 p 的读法。

2,一部分方言合乎韵书上的读法,另一部分方言不符合。譬如,“谱”,北京语音是 p',而许多方言是 p。在《广韵》上它是帮母。我们不能说,从前有个帮母,后来分成 p、p',只能说,读 p 的合乎《广韵》系统,读 p' 好像是滂母来的,我们不能把 p' 推到帮母上去。

3,现在两个不同的读音,是两个不同的来源,在韵书上都是有的,可见韵书是采用一些方言的。以“松”来说,在我们表上是邪母字,按北京应该是阳平。从北京声调看,它好像是从心母来的。再看看在《集韵》上的心母就有松的读法。《广韵》“松”只有一个音,《集韵》就有两个。方言中的“松”字,有的是浊音,是从邪母来的。(钱按:《集韵》鍾韵“松”有“祥容”、“思恭”二切。)

由此想到,济南的冰叫“冻冻”、冰锥叫“冻冻凌子”,许多济南人把“冻”字写作“冬”,这样写是因为这个“冻”字读阴平。殊不知“冻”在《广韵》中有两个音:一个是去声送韵“多贡”切,“冰冻,又音东”;另一个是平声东韵“德红”切,“冻凌,又都恭切”。济南“上冻”的“冻”还是去声,可见济南分别保存了《广韵》的两个音。看来我还得再仔细琢磨丁先生讲课的笔记才是。

研究班第三期开学后,我搬到了二楼女教师宿舍,而且在辅导员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这间办公室除我之外都是语言所的青年同志,有五六个人。我随着这些老师活动。当时

语言所对青年同志的学习抓得很紧,我们除了随班听课以外,还得学习外文和古文。外文以自学为主,古文的学习方法是定期对某篇文章进行逐字逐句的讨论。我们的办公室正好在丁先生办公室兼宿舍的对门,丁先生常常过来指导我们学习。从那以后,我跟丁先生的接触就比过去多多了。丁先生喜欢下五子棋,乒乓球也打得很好,这两项我们几个青年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许多朋友都回忆说丁先生好送书给学生。丁先生也送书给我。丁先生送给我的书有商务印书馆的《四角号码新词典》、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大概丁先生喜欢宋词,好几次指定了某一篇让我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那文字用韵,那意境情感,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我也受过丁先生的批评。那是我回到山东大学以后的1959年,山东方言普查的总结工作即将开始,我担任总结组的组长,被派去北京请教工作进行。当时丁先生见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着手有点着急,说了我几句,之后就详细交代了山东方言总结工作的要求、内容和方法,还送给我一份词汇调查表。临回山东前我去向丁先生告别,丁先生又表扬起“山东的工作还是不错的”来了,鼓励我们一定写好山东方言普查报告。这项工作,我们完成于1960年,写出了《山东方言语音概况》。此后,见丁先生的机会就少了。

1974年,我们集体编写的《学习字典》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字典,考虑到中小学教师和自学者的需要,收字达10800余个,业务方面又有蒋维崧先生把关,发行后社会上反映不错,也得到丁先生的肯定,但是仍然不免存在缺陷,于是常有读者来信指正,这些信件一般都由我处理。在我那本集中记有各方意见的字典中,也用醒目的红笔记录着丁先生的意见。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那天丁先生一见我就说:你们《学习字典》的“乘”字,读 shèng 的第三个义项“佛教教义”应该改为读 chéng,现在北京“大乘胡同”的“乘”就是读 chéng 的(胡同名我记不准了,但北京胡同名称中有一个“大乘”、“小乘”的“乘”读 chéng,丁先生说得很清楚)。你们现在读为 shèng,恐怕是受了以前《现代汉语词典》的影响,我们改过来了,你们也要改。我后来查过几种字典、词典,“乘”字有 chéng、shèng 二音,佛教教义这个义项,《新华字典》(1971年商务印书馆本)没有收,《辞海》读 chéng。《四角号码新词典》读 shèng,从丁先生的话来看,可能早年的《现代汉语词典》也读 shèng,后来改为读 chéng,根据是地名读音。

最后一次见到丁先生,那时语言所还在学院路北京语言学院附近。那一天丁先生见我去了特别高兴,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把我的母语嵎县话写出来,说这个方言八个声调,是很有特色的,写出来后可以拿到《方言》杂志发表。可惜我忙于应付山东方言的调查,一直没有腾出手来深入研究嵎县话,实在是辜负了丁先生的希望。我现在已经为家乡的地方志写了一个简单的方言志,写过一两篇语法方面的文章,但这些都只能说是我研究母语的开始。

丁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这只有当我在以后《学习字典》的编写中、在不断的方言调查和教学实践中,才能慢慢有所体会。丁先生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无论治学、为师,只要想到了丁先生,我立刻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听说建立汉语方言音档是丁先生的遗愿,所以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济南话音档》的编写任务,后记中说:“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脑子里不时浮现梧梓师亲切的笑容,督促我务求学术上有所创新,工作上一定要认真仔细”。

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下,知识有时就成了资本,甚至权术可以胜过学术。但是人间总有真情在,正气在。丁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丁先生的精神,永远默默地滋润着学术大地,净化着学术空气。

(本文责任编辑 李 蓝)

[钱曾怡 山东大学中文系 250100]